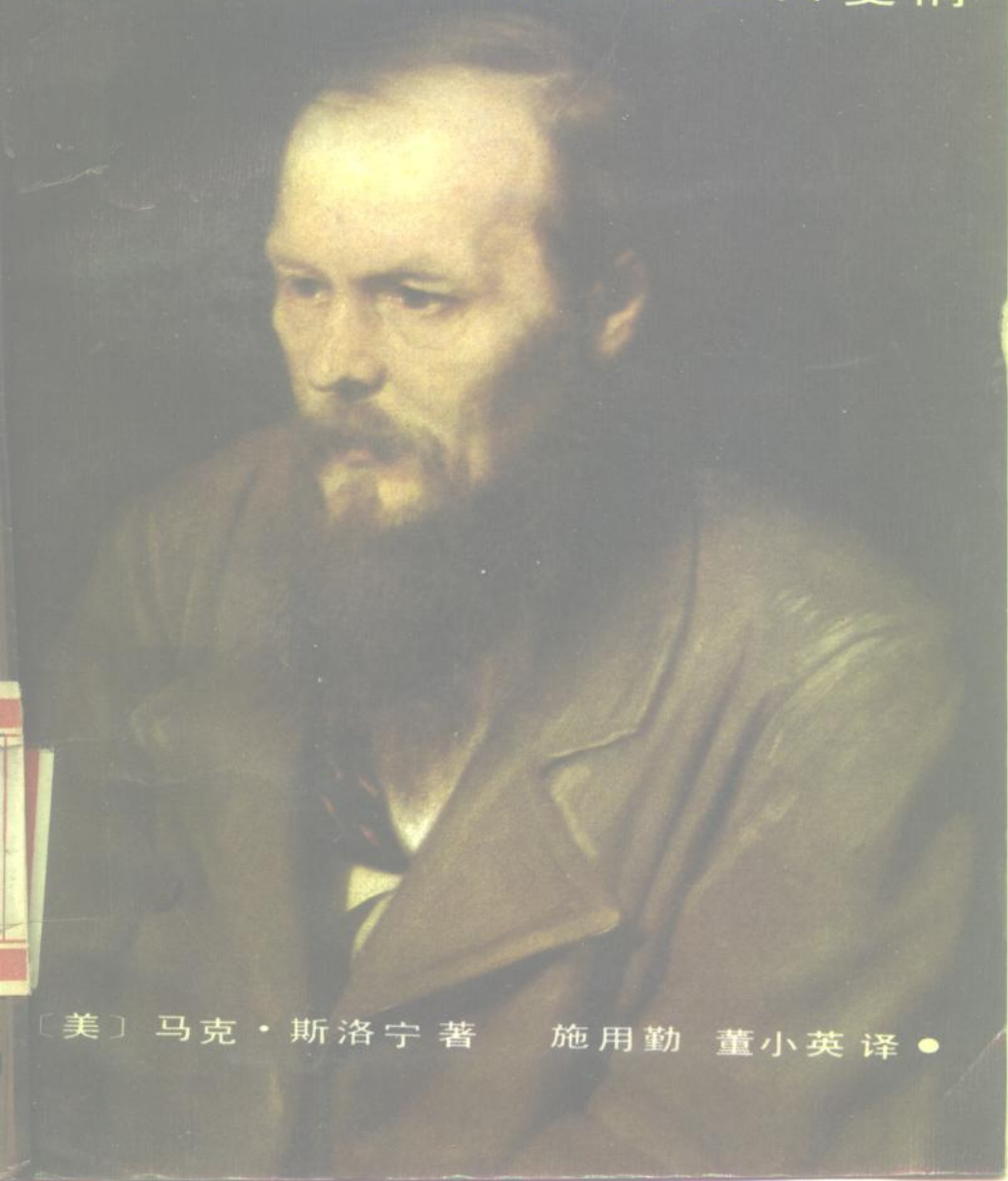


# 颠狂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马克·斯洛宁 著      施用勤 董小英 译 ●

# 颠狂的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马克·斯洛宁 著  
施用勤 董小英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Марк      Слоним  
Три      любв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

根据美国纽约契诃夫出版社1953年版本译出

## 颠 狂 的 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

〔美〕马克·斯洛宁著

施用勤 董小英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300册

\*

ISBN 7-5059-0599-6/I·386 定价：2.70元

## 内 容 提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巨擘，曾在他的小说里如此激动地谈论性的秘密、性的失败和性的疯狂。他不仅塑造了斯维德利加伊洛夫、斯塔夫罗金、老卡拉马佐夫等一批淫荡好色之徒、强奸幼女犯、诲淫者，还描绘了一批行为放浪的女人。

人们不禁要问，他笔下的欲火中烧的男女主人公那令人难以忍受，有时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性行为是从何而来的？他所创造的充满了激情和淫欲、犯罪与复仇、精神亢奋和肉体狂乱的世界，是来自对别人的观察，还是亲身体验的结果？他在年轻和成年时爱过谁？恋爱经历如何？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丈夫和情夫？

## 前 言

---

在我写这本书的三年期间，我从未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传或对他的生活经历和他作品之间的关系加以评论和研究。我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就是仔细地研究伟大作家与女人交往的历史，尽可能完整地叙述他的风流韵事和两次婚姻，既不可耻地隐瞒事实，也不象在传记中常见的那样“美化”事实。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爱及其爱情悲剧的细节、成功与失败的兴趣，决不是出于无聊的好奇，也不是不健康的想象力的游戏。他在小说里那么激动地谈论性的秘密、失败和疯狂，不懈地塑造了从斯维德利加伊洛夫、斯塔夫罗金到老卡拉马佐夫等一批淫荡好色之徒、强奸幼女者、诲淫者，那么洞察秋毫地描绘了“恶魔般的”行为不端的女人，使人不禁要问：有关他那些欲火中烧的男女主人公那令人难以忍受、有时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性欲的特殊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他所创造的充满了激情和淫欲、犯罪与复仇、精神亢奋和肉体狂乱的整个世界，是来自对别人的观察，还是亲身体验的结果——因为感情的风暴在他本人胸中激荡，在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肉体的诱惑和冲动？他在青年和成年时曾爱过谁，恋爱经过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什么样的丈夫和情人？

叙述这些并不容易，题材本身就很“危险”（当直言不讳地讲述事实时，词汇不是变得沉重就是变得粗俗），如果叙述的是象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天才和病态人物时，很难掌握

适当的分寸，因为他本人无论在哪方面都不知道有什么限度，于是，传记家只好经常在憋闷的病理学地下室中跟踪他。他的许多性格特征和生活事件迄今仍是难解之谜。流传着许多有关他的轶事、谣言以及可怕的推测，其中有些还是他的亲朋好友散布的。他的两次婚姻和他同苏斯洛娃关系的真实情况，只有他的少数几个朋友知道，在他逝世后，了解情况的只限于狭小的专家圈子里的人物和几个上一辈的代表人物，传到大众耳朵里的只是一些模糊的暗示。

两种情况使上述状态延续了几乎半个世纪。我们了解托尔斯泰和生活中最隐秘的详情，因为他是最客观、庄重的俄国作家，他的全部作品——从《童年》、《少年》直到《复活》——是一部宏大的自白书。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极端主观的作家，他把他的小说变成了充满激情的独白，间接而勉强地把自己生活中的隐私部分地表现在作品中，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传性的著作。他是一个冷淡的人，素来寡言少语，当涉及到他个人问题，尤其是爱情时，除少数例外，他总是避免吐露真情，甚至在给他所爱的女人的信中也不愿表白自己的感情。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努力地把他往来信件和笔记中不合她意或过分坦率的地方统统用浓墨涂掉。过去的和现在的都逃不过她的检查：她仔细地抹掉了作家对第一个妻子的所有好评，以及在老年时对她本人的过分热烈的爱情表白。在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严肃呆板的形象的道路，一些传记作家对她亦步亦趋，对有损这一形象的一切都有意地缄口不言。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十年后，才开始公布未经粉饰过的传记材料（其中有一部分仍未逃过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的监视）。20年代和30年代，出版了他的三卷书信集（第四卷预计在1934年出版，但在苏联未能问世，其原因每个了解共产党政权对《群魔》一书作者的态度的人都清楚），还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的各种异文、写作

方案、札记等，几位接近过他的女人的回忆录、日记，同时代人的见证以及一系列其它文献资料也纷纷问世。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掌握了这样一些材料，它们使他能够评价性与爱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所起的作用。在这个此前一直被视为禁区的领域中挖掘出来的东西，使他的个性和作品放射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异样的光彩。

我不想用无数的脚注来累赘正文，但拙著中一切事实描述（细节也包括在内），都可以从本书所附书目索引中指出的材料来源中的有关文字中得到证明。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感情和肉体上的眷恋或是根本就无人知晓，或会使人产生疑问，有些东西只能凭猜测。我自认为有权说出我的猜想并加以推测，我的工作不仅仅是罗列事实和事件，而且要从批评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我尽力避免作一个编年史家，力图作一个叙事人和解释者。当然，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驳斥我所作的解释，但他应该知道，我不曾为迁就解释而放过任何细节或牺牲叙述的真实性。本书中有些地方显得不可信或不真实，这决不是处处避免夸张的作者的过失。请不要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比他笔下的任何一个主人公都复杂，他是天才的癫痫病患者，是一个“被剥去了皮”的人，他经历了死神的可怕考验、苦役、贫困和孤独，他是一个病态的情夫、神经质的不安分的探索者，他的一生是绝无仅有、非同寻常的一生。因此，如果在叙述他的爱情和情欲的故事中充满了意外和矛盾，有时与他小说中激动人心、令人痛苦的篇章如此相象，就不足为奇了。

## 目 录

---

前 言 .....1

第一部 初恋 ..... 1

第二部 永恒的女友 ..... 81

第三部 幸福的婚姻 ..... 151

后 记 .....237



## 第一部

---

### 初恋



## 第 一 章

1849年12月24日清晨，十六岁的贵族中学学生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男爵凝望着窗外，他透过彼得堡冬季的朦胧晨光，看见一辆接一辆的双驾马车。这种马车通常都是那些就读于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的名门闺秀或是皇家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女生乘坐的。但是那天早上，车里坐的却不是那些年轻姑娘，而是一批国事犯：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二十名成员被押往刑场。他们于1849年初被捕，此事在首都各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们纷纷传说：秘密警察破获了一起反对专制政体的阴谋；在这个组织中宣传社会主义、鼓吹政治自由、解放农奴以及其他一些煽动性的胡言乱语。谋反者的首领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朋友H·斯佩什涅夫、H·卡什金、A·叶夫罗佩乌斯都是弗兰格尔就读的那所亚历山大贵族中学的毕业生。因此，宪兵们曾在这所学校的各班中搜查违禁书刊。弗兰格尔当然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当时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一案十分关心。那时，只能在极亲密的小圈子里谈论他们，尽管如此，仍要压低声音，因为传说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此大发雷霆，下令严惩该集团的成员，以儆效尤。弗兰格尔的近亲、后来担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要塞司令的卡尔·叶果罗维奇·曼德尔施泰恩，当时是军事法庭的检察官，这位贵族中学的青年学生在圣诞节回家度

假期间从他那里得知，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已被判处死刑。其中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弗兰格尔刚刚读过他的成名之作——长篇小说《穷人》和尚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涅托契卡·涅兹凡诺娃》。这两部小说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因此，当他听说他所热爱的作家将被处死时，感到十分痛心。

在这难忘的12月24日的早晨，弗兰格尔的叔叔、近卫军骑兵团的军官，将率一个连去处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刑场担任警戒，他答应带侄儿去刑场。

这批犯人将在谢苗诺夫斯基校场处决。当弗兰格尔到达那里时，刑场已被军队团团围住。在黑色的士兵方阵之外，聚集着一些偶然路过这里的农夫、女商贩和身穿粗布衣服的普通百姓，“纯粹的观众”几乎一个没有。弗兰格尔的另一个亲戚，也是现场值勤军官，跑过来劝小伙子立刻离开刑场，因为一个贵族中学的学生对此过于关注，难免会被怀疑为对死刑犯的过分同情。

弗兰格尔有些胆怯，答应回家，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离开刑场，而是混进了人群中。这一勇敢的举动他不敢对任何人泄露，始终守口如瓶。

他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见在刑场中央有一个带台阶的木制断头台，另外还有一些栽在地上的木桩。犯人的外衣已被剥掉，身穿衬衣站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他们分站在断头台的两侧，一侧九人，另一侧十一人。检查官宣读判决书。弗兰格尔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因参与阴谋活动及传播文人别林斯基恶毒诋毁东正教和国家最高政权的信件<sup>①</sup>，并伙同他人图谋以石印机印发反政府作品未遂

① 别林斯基就《与友人书信集》（1847年版）致果戈理的信，愤怒地抨击了果戈理的反动及其对教会和农奴制的忠诚。这封信因书刊检查制度条例不能发表，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非法传播。别林斯基于1848年逝世；当局未能在其死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传播和阅读该信件者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褫夺公权……”。接着，神父替下了检察官，手擎十字架站在断头台上，建议罪犯忏悔。只有一个犯人作了忏悔。其他人只是虔诚地吻了吻神父迅速默然地举到他们唇边的银十字架。此后，给彼得拉舍夫斯基、蒙别利和格里戈里耶夫套上了殓服，他们三人被蒙上眼睛捆在木桩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第二组中等待死神降到自己的头上。一名军官率领着一排士兵在木桩前一字排开，士兵们举枪瞄准，正当该下达“放”的口令的瞬间，一名高级军官挥了挥白手帕，制止了死刑。犯人从木桩上解了下来，格里戈里耶夫已站立不稳，他在等待死神来临的几分钟内竟疯了；蒙别利的头发瞬间变成了白色。接着又宣读了新的判决书——沙皇的恩典。陀思妥耶夫斯基改判为在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然后再就地当兵四年。罪犯们获准穿上外衣。弗兰格尔不再等待，趁罪犯将被押解回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要塞之时，悄悄地从人群中溜了出来，赶紧回家，他由于激动和怜悯而浑身战栗。

弗兰格尔在贵族中学毕业之后，又在司法部门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四年以后，经他主动申请，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区的检察官。这个行政区包括吉尔吉斯草原东南部和阿尔泰州西南部。西伯利亚那时才刚刚开发。而弗兰格尔却向往着边远地区，因为对他来说，旅游和狩猎远比法律学有趣。

当他将要远行的消息在彼得堡传开时，他又一次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姓氏。过去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在鄂木斯克服苦役刚刚期满，随即在1854年3月被编入西伯利亚第七边防营当列兵。这个营驻扎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正是弗兰格尔任职的地方。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请这位旋即赴任的新官给流放者带封信和一些钱。年轻的检察官欣然接受了这个委托。

1854年11月，弗兰格尔终于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他刚刚在当地商人斯捷潘诺夫家安顿好，立刻就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前

来会面。他似乎觉得自己早就了解这个人，迫不及待地等着与这位过去的作家、苦役犯，今日的列兵会面。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屋里时，弗兰格尔的双眼紧紧地盯住来人。在他面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健壮士兵，穿着一身肥大的粗呢军装。从他的全部外貌、身材和服装上看，这是一个地道的平民百姓，没有一点贵族和知识分子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貌是那种在俄国的手艺人、市民、敬神的商人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粗硬的暗棕色连鬓胡，浓密的髭鬚下露出一张薄薄的执拗的嘴，宽宽的额头上眉弓突起，一头浅发剪得短短的；两眼深陷，下眼圈发青；一脸病态，面色如土、苍白暗淡，脸上有几颗雀斑，双颊和额头上布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的嗓音低沉而嘶哑，这是少年时患咽喉病留下的后遗症。他说话说得又轻又慢，只用一些简单普通的词汇，好象不大愿意讲话似的。但是一旦振奋起来，言语立刻变得响亮而迅速，言词中流露出激情，他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他的动作虽然急躁、甚至有点生硬，却也不乏生动、轻捷。此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刚才的忧郁消失得无影无踪。

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读哥哥的信时，眼里流出了泪水。这时，弗兰格尔也接到了从俄罗斯寄来的信函，想到自己的家庭和彼得堡远在千里之外，再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尽磨难的痛苦面容，他不禁也热泪盈眶。年轻的检察官和国事犯互相凝视了一会儿后，紧紧地拥抱起来。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此开始。当时，弗兰格尔二十一岁，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三岁。

## 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军役并不轻松：每天一早就开始队列训练、操练步法、值勤、到离城三十俄里处去

砍伐木材，而且还有靠棍棒、皮鞭和打嘴巴维持的严厉军纪。在肮脏的木营房里，士兵们两个人挤在一张又窄又硬的铺板上睡觉，床铺间经常有饥饿的老鼠来回乱窜。主要的食物是稀粥，用自制的匙子从铁桶里舀来吃。尽管这样，对经历过鄂木斯克四年苦役<sup>①</sup>（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活埋、是被装在棺材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仍是一个可喜的变化。有些传记家认为苦役中的生活并不那么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中“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关于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写得很明确：“那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无穷苦难”（1854年11月6日第64号信）。除了体力的衰退、精神病发作、两腿风湿病和胃病，以及他所遭受的侮辱和欺凌（克利夫佐夫少校用鞭答惩罚那些在睡梦中叫喊或违反右侧卧规定而左侧卧的犯人），他还因必须总是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而痛苦，而他周围的都是杀人犯、盗窃犯、暴徒和疯子。他时时刻刻都要和他们打交道，而这些人对他抱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因为他是他们之中唯一的一个贵族。他也没有和波兰贵族流放犯及另一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C·杜罗夫交往。因此，整整四年他都是在完全的孤独中度过的，但又没有任何离群索居的可能性。一旦能远离这拥挤、不自由、令人窒息的苦役牢房、不再需要在背上背着黄方块<sup>②</sup>、戴着十普特重的脚镣走路，不再在矿井和砖厂里拼命地做苦工，能重新获得自由、过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服苦役时的生活条件，可参见他1854年2月23日写给哥哥的信。在这封信中，他顺便提到，“我们的生活十分糟糕。我在牢房里整整过了四年，只有劳动时才能出来。在连阴天、潮湿、泥泞以及冬天难以忍受的严寒中劳动，累得我筋疲力尽。我们都住在一起，在一间牢房里挤做一团。夏天闷得难受，冬天冷得要命。地板全已腐朽，地板上的垃圾有一俄寸厚，不小心就会滑倒。我们睡在光板铺上，上面只准放一个枕头。跳蚤、虱子、蟑螂到处爬。伙食只有面包和汤，汤是素的，清水煮白菜。我的胃坏了，经常犯胃痛。由于神经失调，我犯了羊角风，两腿也患了风湿病。”

② 苦役犯的标志，革命前被判罚苦役的人在背上缝一块红色或黄色的方布。

——译注

上人的生活，即使是在军纪严厉的边防营里做一名列兵，对他来说，几乎也可以说是一种幸福了。在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几个星期后，他写信告诉哥哥说：“目前我在服役，每天操练，恢复旧日的知识。我的健康相当好，在这两个月里，我的健康状况已大有好转。”他在体质上有所增强，精神病发作的次数也减少了（原来每三个月就要发作一次）。他把自己的精神病发作诊断为：“它很象羊角风，但又不是羊角风”。尽管他享受的自由是十分有限的，但他对它的感受却是如此之强，以致他竟然察觉不到自己的贫穷：他没有钱，只能靠哥哥偶尔从俄罗斯寄来的少量接济；同时，他对由于士兵身份和曾是苦役犯所招致的一切不快，也毫不理会。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所在连队报到时，绰号叫“暴风雪”的连长韦杰尼亚耶夫对事务长说：

“这个人刚服完苦役，对他要当心些，一点儿也不能放松。”几天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营房稍稍迟了一点，事务长就在他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他在熟人家里作客时，军官都把他当成勤务兵，专等他为自己脱大衣。但是，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站在队列中，手拿棍棒，棒打又一个被牵过“绿街”<sup>①</sup>的牺牲者的脊背。韦杰尼亚耶夫自己在队列后面巡查，看哪一个打不起劲、不卖力气，就在他背上作个记号，然后，再鞭打那些背上画有记号的兵。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参加这种体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一次体罚之后，他竟跌倒在地，抽搐起来<sup>②</sup>。

塞米巴拉金斯克靠近中国边界，19世纪50年代，这是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一个闭塞的地方。它的名字得自在额尔齐斯河陡峭

① 乱棍刑，农奴制时代俄国军队中对士兵的一种体罚形式，受罚者被牵过排成两行的士兵之间，由士兵施以乱棍。——译注

②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队列里，脸色惨白，面部神经质地抽动着，他用颤抖的双手举棍依次打在受罚人的身上，当晚就犯了羊角风。”他在给弟弟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中写道：“苦役结束后，我成了十足的病人，但还要（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列队操练、上课、参加阅兵，整个夏天我忙得几乎连睡觉的功夫都没有。”



的右岸上的七所邸宅的遗址<sup>①</sup>，它们是18世纪遗留下来的。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这个地方曾是蒙古的中心。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羊胛骨（即游牧民族的碑）上的铭文证实了这点。19世纪中叶，它成了俄罗斯帝国的前哨阵地，变成了一个建有石碉堡的军屯点，士兵住的板房密密麻麻地挤在碉堡周围。这座小小城镇的居民连同卫戍部队一起，人口不超过六千人。石头建的教堂、官办的药店和杂货店就是此处的名胜。从塔什干、布哈尔和喀山来的商人都在帐篷、木棚子或是以货易货的露天集市里作买卖，这些集市是用栅栏围起来的，是骆驼商队和马驮子商队集结的地方。这里的物价都很高，是低级军官无力光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能够享受的是市场上卖的方面包和面包圈。没有铺石板的街道，到处都是沙子，沙子在秋天变成泥泞，夏天则变成尘土。没有植被，在所有木屋前面既没有树，也没有灌木丛，到处是光秃秃的，一片凄凉，好象在沙漠里一样。离城不远就是连绵几百俄里的针叶林，里面有枫树、松树、白柳等。夜幕降临，街道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没有路灯，只有无数的看家狗的吠叫声暴露出这里有人居住。房屋里的装饰异常简陋，是半亚洲式的：羊毛毡挂在墙上或铺在地上，偶然有几家墙上还挂着描绘1812年<sup>②</sup>的英雄纵马狂奔的木版画。邮件每星期来一次，订阅报纸杂志的只有十五人，有教养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交换新闻、了解首都的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官别里科夫中校自己不喜欢看报（认为这有损健康），而喜欢听别人读报。因此，当他知道有这么一个贵族出身的“大知识分子”小兵时，就把他召来为自己读报。从这时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解塞米巴拉金斯克的社交界。这里的社交界如同外省各地的一样，人们主要从事赌牌、播弄是非、酗酒。

① 塞米巴拉金斯克是由Семб (7) 和палата (邸宅) 构成。——译注

② 指俄国抗击拿破仑侵略的战争。——译注